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者文库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组织编写

文化冲突 与 社会矛盾

黎德化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者文库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组织编写

文化冲突 与 社会矛盾

黎德化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冲突与社会矛盾/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组织编写/黎德化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6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者文库)

ISBN 7-200-06411-4

I. 文… II. 黎… III. 文化—研究—世界 IV. 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2405 号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者文库

文化冲突与社会矛盾

WENHUA CHONGTU YU SHEHUI MAODUN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组织编写

黎德化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1230 32开本 9.25印张 240千字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0-06411-4

C·144 定价:24.0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者文库》

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张建明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丰子义 白暴力 刘宇辉

许崇德 吴树青 沙健孙

陈占安 周之良 钱淦荣

黄楠森 梁守德 薛汉伟

着力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队伍建设

（代序）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 朱善璐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对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具有重要作用。2004年以来，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宣部、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进行了全面部署。北京市一直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近年来，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在课程学科建设、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这次组织评审、出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者文库》（以下简称《文库》），就是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科学性，要求广大教师不仅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还要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素养，这是增强实效性的重要基础。几年来，北京市以培养一批在全市、全国有影响的中青年骨干教师为目标，开展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工作，在学校推荐的基础上，三批共确定了40名中青年教师作为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人选，通过研讨交流、科研立项、学习考察等方式进行重点培养。同时，

注意发挥北京高校老专家、老教师的优势，聘请了吴树青、沙健孙、周之良、黄楠森、许崇德、薛汉伟、梁守德等一批著名专家担任培养人选的指导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进行具体指导，以老带新，薪火相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首批《文库》就是以学科带头人的科研成果为基础，采取开放评审方式，吸收了其他中青年教师的优秀成果组成的，体现了近年来北京市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科研能力建设的初步成果。

《文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坚持科学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研究。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育人的重要阵地，对教师的素质有着更高的要求。首先必须要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科学的世界观，同时还要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不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还要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教育教学。当前，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心，帮助学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体系，指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和分析问题，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文库》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研究，坚持科学性，体现了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一些学科和领域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二是注意把握前沿，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探索 and 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如何以这一发展着的理论武装大学生头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必须立足时代发展前沿，紧密结合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探索并充实到教学内容之中；不仅是教育者，要能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是研究者，要对发展和

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贡献。这既是新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要求，也是对理论工作者的要求。北京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人才方面具有良好基础，理应做出更大贡献。出版《文库》就是加强这方面工作的一个尝试。《文库》书目选题涵盖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德育、历史等众多学科，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研究领域十分宽泛，但都注意把握学科前沿，紧密结合国家经济社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和论析，主题突出，分析透彻，富有创意，体现了研究者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可贵的探索精神，有助于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理论武装工作，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

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实践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突出特点。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学生在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存在着困惑。教育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不能脱离实际，进行单纯的理论说教，而是要紧密联系大学生关心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文库》大部分选题来源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之中，但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结合实际，深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同时我还注意到，《文库》的作者都是中青年教师，他们已经是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的骨干力量，这既体现了北京市与学校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也为我们贯彻落实好中央精神，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坚实的人才队伍支持。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针对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

学社会科学一些学科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加这些课程和学科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这需要我们做出艰巨而又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根据中央要求和部署，要实施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方案，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这涉及到教学理念、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头绪多，任务重，责任大，要求高。因此，我非常欣喜地看到一大批中青年教师成长起来，承担起了教学科研工作的重任，也希望各高校和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为高等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伟大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2006年5月

目 录

绪 论	1
一、文化——世界的热点	1
二、两种历史观的对立——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史观	4
第一章 文化与文化冲突	9
一、什么是文化	12
二、文化的结构	16
三、文化的模式	24
四、文化冲突及其类型	25
五、文化冲突的社会作用	39
第二章 文化冲突的思想论战	44
一、亚洲金融危机与东西方价值观	44
二、“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	50
三、复兴儒学还是全盘西化——传统文化与 现代化的冲突	64
四、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79
五、人文主义与消费主义	86
六、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	92
七、谁应该对环境危机负责	100
第三章 文化冲突中的行为对抗	124
一、黑人文化的愤怒	124
二、嬉皮士运动中的另类文化	128
三、绿色和平运动的斗争	137
四、宗教战争与宗教冲突	141

五、狂热的“追星族”	145
第四章 文化冲突的社会根源	147
一、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矛盾	148
二、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	165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	197
四、民族矛盾与种族冲突	211
五、三大差别	225
六、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234
七、社会矛盾与文化冲突的关系	236
第五章 文化冲突的社会解决	247
一、文化冲突与文化和谐	247
二、解决文化冲突的一般原则	251
三、解决文化冲突的社会条件	261
参考文献	281

绪论

一、文化——世界的热点

1996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该书认为19世纪是民族国家的冲突，20世纪是意识形态的冲突，21世纪将是文明的冲突，因为今后各文化之间、各宗教之间和各种族之间的边界将成为分界线。他还断言文明将成为未来战争的根源。他借当代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理论，说明他提出的“文明”已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等而成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切国际纷争的“范式”。在他看来，文明的核心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宗教，文明冲突实质上是文化和宗教的冲突。该观点发表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仅在《外交》杂志上就发表了7篇反驳亨廷顿的文章，也有人出版著作反驳亨廷顿的观点，例如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就写了《文明的共存》一书来反驳亨廷顿，认为文明可以共存，而不一定或不必然冲突。

由于文明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亨廷顿的这一观点，再一次把人们拉回到了“文化热”。为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文化热”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于文化的关注，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以《尚书》为代表的群经系统和先秦诸子，在西方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然而，较明确而系统关注文化的社会作用的，则要数意大利的哲学家维柯，他很早就提出了历史是文化史的思想。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1756年出版的《论各国的风尚与精神》一书中第一次试图写一部把文学、艺术、经济、政治等方面综合为一体的文化史，而且认为文艺复兴是一次新文化运动。不过，

这些探讨还只是个别和小范围的，即使是近代以来的以文化考察作为重要思考方法的社会学也是如此。在殖民主义时期，西方殖民主义者就已经开始关注殖民地国家的文化问题，不过这种关注只是从如何更好地征服殖民地人民的角度来看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个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掀起了民族独立和追赶现代化的浪潮，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口号，并由此关注发达国家的文化。但文化问题真正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还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时期的到来而到来的。

在 20 世纪的 70 年代末，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把工厂迁到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不发达国家，并专注于发展高科技和高文化的产业，这样，世界就进入了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化的创造力得到了各个国家广泛的关注，结果就出现了今天人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或者说经济一体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全球化的问题也摆在了世界各国人民面前。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各个国家为了争取自身的经济利益，吸引其他国家的注意，加强和其他国家的交往，必然有一个让其他不同文化的国家认识、了解直至最后理解和接受本国文化的过程，也就是让自己的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或者说是文化全球化的过程。这就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热”。1983 年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宣布，当代哲学研究的重点已从科学哲学转向文化哲学，正如法国学者埃尔指出：“它显然不单单是一种时髦的表现；各种迹象表明，它实际上表达了各种深刻的需要和忧虑；许多人甚至似乎把过去对哲学问题的关心转向了所谓的文化现象。”^①

我国“文化热”兴起的原因是复杂的。1981 年下半年，“中国问题小组”为在若干年内完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部分的撰写任务，率先提出研究当代中国不同于 17 世纪和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文化问题，亦即古代中国文化如

^① [法] 埃尔：《文化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 页。

何现代化的时代性问题。此后，各地相继举行了各种研讨会，出版了许多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到1985年，由学术界对文化的关注逐渐演化成为全国性的“文化热”。这种趋势与世界的文化研究热是一致的。这要归因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长期的对外封闭，刚开放的中国打开了国门，随着邓小平乘坐的马车在华盛顿那漂亮的草坪上的转动，西方世界那五彩缤纷的景象一下子就抓住了中国人充满好奇的目光，就像一间常年关闭的房间猛然打开了门窗，在强烈光线的照射下，人们看到了和西方的巨大反差，也看到了中国的贫穷与落后。这种强烈反差给人们带来的冲击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寻找导致这种反差的原因，从而掀起了中国的“文化热”。归纳起来，我国“文化热”的发生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必然要求中国文化与之相适应。改革是一场全面而又深刻的革命，不仅要引起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变革，而且要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要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革，又必须以相应的文化变革和文化现代化为前提。尤其是随着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特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形成的新思想、新观念与传统的思想文化发生了冲突，迫切要求我们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创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意识。正因为如此，“文化热”的兴起，是深刻地反映了时代或我国社会历史实践的“客观辩证法”。当我们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到“改革”、“开放”上来以后，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审视、选择和重构的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绝不只是“物”的现代化。不仅要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物质的基础，而且必须同时进行政治、法律、教育、科技体制的改革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理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风尚的改革。

第二，是对外开放的结果。由于实行对外开放，扩大中外文化交流，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思想文化纷纷引进和传入我国，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促使人们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研究，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中一切对我们有价值的因素，丰富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和原因的汇集，促成了我国的“文化热”。

第三，是对十年动乱的反思。“文化大革命”后，人们开始了反思。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思想界在开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际，以文化为中心的讨论也就有了开始的基础。

第四，真理标准的讨论，为我国的解放思想运动拉开了序幕，也创造了文化讨论的基本前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讨论才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两种历史观的对立——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史观

然而，对文化的关注是一回事，如何看待文化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各国的文化总是特定历史的产物，特别是特定经济、政治的产物，不同的文化往往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观，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因此，在世界文化交往中，各种文化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对于世界范围内的这种文化热，人们一般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形态间的冲突较多，特别是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文化冲突的研究较多。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文化冲突的研究，一般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关系的角度研究较多，而较少从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冲突。关于社会矛盾，论者们一般从国内的阶层变化和阶级结构变化的角度研究较多，而从世界范围内来重新审视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的变化则较少。

在我国，关于文化冲突问题，论者们一般都能认识到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文化之间冲突的生产方式原因，并且认为单纯的复古主义与简单的全盘西化都不是解决这种冲突的好办法，也能认识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各有各的长处和弊端。例如，新儒家就认为西方文明有其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而西化论者也看到了东方文化的一些弊端。在这方面的积极成果，是一些论者提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补。在社会矛盾方面，一些论者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级结构所发生的变化，指出了我国工人阶级的结构成分在新时期的新特点，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数增加、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等特点。

然而，尽管一些论者看到了文化冲突的事实，却没有深挖造成这种冲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相反，一些人甚至把文化本身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种原动力，并试图用文化的发展来最终解释社会的发展，把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完全归结为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文化成为造成一切社会矛盾的终极根源。这样，实际上就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史观。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从人类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发展规律去研究社会的唯物史观被抛弃了，他们对于文化冲突的真实根源——世界范围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却视而不见。令人更加担忧的是，在—些人那里，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只要排除了一切其他文化的干扰，让全世界统一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旗帜之下，全世界就会实现文化的大同和社会的大同，人类的共同幸福就会实现。

其实，用文化来解释—切的做法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了。例如，前面我们提到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很早就提出了历史是文化史的思想。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前提，也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并且认为这样的一种文化精神正是造成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在原因。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否认了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成为了一种

“文化决定论”。韦伯的“文化决定论”掩盖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肮脏和罪恶，也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基础和矛盾，因而成为历史唯心主义的一种翻版。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更用地理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文化差异来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来论证西方帝国主义对广大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的合理性，来论证西方白人对黑人的任意贩卖、奴役和杀害的合理性。不过，把“文化决定论”表现得最充分、坚持得最彻底的人，还当数现代的一个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文明和文化是人类的终极部落，文明和文化的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亨廷顿的断言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印证，愈演愈烈的“反恐战争”遭到了众多伊斯兰国家的反对，而恐怖袭击也有在基督教发达国家扩大的趋势。当美国及其盟国把枪口瞄准恐怖主义者时，美国的一些思想家还没有忘记为下一个打击目标——中国——制造舆论，他们把中国妖魔化，大力制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攻击儒家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障碍等等。

由此看来，如何认识文化现象，特别是如何认识文化冲突，就成为理论界重新认识人类社会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毫无疑问，在今天的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的社会冲突。如何认识这些社会冲突呢？我们必须看到，是把一切社会冲突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冲突呢还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生活中、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生活中来理解这些社会冲突和文化冲突，是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分歧。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出发，我们就会看到：对于文化冲突的研究必将突破价值观的层面，而深入到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层面。而在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的研究方面，则必须突破经济利益冲突研究的层面，而扩大到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方面。在这两个层面里，社会矛盾无疑是更为根本的层面。同时，我们还必须把社会矛盾冲突的研究从一国扩大到世界范围，并从国与国之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冲突来探讨社会矛盾和阶级

斗争的新趋向、新特点和新方向；从文化史观出发，人们最多只能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各种冲突。这就把社会冲突的原因归结到人的思想意识方面，也就是用人的主观精神来对人类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等根本性的问题做回答。毫无疑问，这样的做法是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它不可能对社会冲突的问题做出彻底而科学的说明。

在我国，一些论者习惯于把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冲突的主要倾向看成是代表人类文化发展方向的现代化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看成是这样的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对立，并且把我国社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文化价值观的改造上，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接受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这样的看法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现代化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种趋势。不过，对于文化冲突，这些论者没有或者不愿意进一步分析造成文化冲突的社会原因和利益冲突方面的原因，有的甚至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容讳言，这样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文化史观的范畴之内，难免有历史唯心主义之嫌，因为文化层面的冲突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它的发生一定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透过文化价值观的层面而看到这些文化冲突所体现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层面上找到解决这些文化冲突的社会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马克思当年所分析的人类社会矛盾尽管其基本内容没有发生变化，但在表现形式和方法上确实有了较大的变化。为此，如何透过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认识在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就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当然，在文化冲突方面绝不仅仅是个阶级矛盾的关系，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矛盾，特别是由阶级矛盾引申出来的社会制度的矛盾。对这些矛盾我们也要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认识。不过，在所有的这些矛盾中，阶级矛盾确实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